

船山信一先生与中国

——以“人学唯物论”哲学为轴

〔日〕西川富雄/文 刁榴/译

—

船山信一大概是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一个日本哲学家吧。我觉得这是船山先生的荣誉。我在立命馆大学曾与船山先生共事过一段时间，先生一点也没有前辈教授的架子，他在学问上的谦虚态度，也体现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上。我非常崇敬先生的高尚品德，现在得以在贵刊发表拙稿，讨论先生的“人与思想”，我感到非常荣幸。

二、访问中国

唯物主义哲学家船山先生（以下省略敬称）很早就开始深切地关心中国。1965年11月，他作为京都学术代表团的一员（担任副团长）访问中国。丘成教授：《访问北京时的船山信一先生》（1999年）中有对于船山此行的回忆。《船山信一著作集》（こぶし书房）第5卷、月报。1965年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建交，田中内阁1972年才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而船山在建交七年前就访问了中国。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我想，在当时贫乏的信息往来中，中国的革命气氛也曾零零碎碎地传至日本吧。当然，因为还没有确立正式外交关系，所以代表团与中国的交流也仅限于学术方面。

船山信一访华期间作了以下三个讲演：滕颖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著有关于此行的回忆：《船山先生与中国》，载于《唯物论研究季报》第49/50合刊，1994年。

另外，船山信一《唯一的道路——我的唯物论哲学学者的历史》（三一书房，1994年）收录有他当时的讲演稿。

《日本的唯物主义》，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1月4日，翻译：丘成教授；

《辩证法的本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1月5日，翻译：丘成教授；

《人学唯物论的立场——相对于唯心论以及客观主义的唯物论》，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1月22日，翻译：金元京教授。

在座谈会上他还作了“战后20年的日本哲学会”的报告。

第一个讲演概述了日本从江户时代至明治、昭和时代唯物论者的思想史。第二个讲演从把辩证法规定为矛盾的逻辑学展开话题，以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为中心讲述了辩证法不仅是思维的辩证法，而且也是存在的辩证法。第三个讲演应该是船山在学术交流中最想谈论的话题，因为众所周知，所谓的“人学唯物论”，正是唯物主义者船山一生所追求的哲学观。对此我将在后面作详细论述。

我到立命馆大学（1955年）任教以来，先是作为副教授，后来是作为后辈的教授接触到船山教授。船山性格稳重温和，毫无矫饰之处，在与他的日常谈话中，能了解到他的各种思想和观点。例如，在批判斯大林之前，他对斯大林主义的独断专行就持批判态度，对所谓正统唯物主义的客观主义并不满足，等等。

船山的日常言谈表明，他很早就开始深刻地思考中国的事情。因此，他才迅速加入了学术访问团，远赴还没有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的中国吧。

为什么船山会对中国进行深刻的思考呢？

1 船山出身于日本东北山形县南部农村的农家。那是个富农家庭，所以他才能走上精英们的成才之路——从旧制高校到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西田几多郎门下。农家出身，使船山非常了解农村的现实状况，尤其是，昭和初期的1930年前后的经济危机给东北农村所带来的普遍影响。留在村里与土地共生存的友人们所体验的艰难困苦，帝国大学哲学科的学生船山也同样痛切地体验到了，这些农村的现实状况，对船山来说决不是与己无关的遥远事情。

我认为，船山与那些丝毫不了解农村和都市劳动者的实际状况就步上精英成才之路的左翼唯物论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曾与船山交情甚笃的三木清、户坂润在战争期间很遗憾地遭到思想警察拘捕而死于狱中，但是三木和户坂都没有详细了解农民和都市劳动者的实况。

所以，对于船山来说，关心拥有广大农村的新中国，关心拒绝都市文明化的中国的发展进程也是很自然的吧。

2 船山对中国的罪责意识。淳朴的东北汉子船山，生来就是“迟钝”的。战后日本的很多知识分子很快便忘记战前、战时的一切而转向战后的华丽生活，但生性“迟钝”的船山却不懂得这种忘却的技巧。

船山有过战前战中所谓的“转向”经历。他积极地参加了“唯物主义研究会”，户坂润被捕并被禁止执笔写作后，船山继续工作，致力于机关刊物《唯物论研究》的编辑，而且也是主要撰稿人。船山登载在《唯物论研究》的有：《这里也谈唯物论！》（创刊号）、《作为世界观的唯物论》（第4期）、《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同一性——为了前进的批判性试论》（第11期）等文章。

这是他生涯的第一期，这一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当时，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经过中日战争，正全力发起“大东亚战争”（当时的称呼），在皇国史观与军部独裁之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自由的。加入“唯物论研究会”和无产阶级科学同盟的知识分子的境遇更糟，他们几乎被一网打尽，全都被拘捕了。当然也有巧妙地逃脱拘捕的聪明人士，但船山是不具备这种精明的，他被捕并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五年执行。在船山服刑期间，“唯物主义研究会”被迫解散（1938年），而且由于处在缓期执行中，船山的活动受到了极其严格的制约。不久，船山开始从事渔村方面的工作，这是他生涯的第二期，船山的生涯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无产阶级文化活动的时代（1933—1936），这一时期很短，是他以唯物论研究会为中心来活动的时期。

第二期是水产业时代（1937—1955）。这一时期最长，包括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延续了18年之久。1944年6月到仙台后，不久就开始担任宫城县水产业会、宫城县渔业共同组合联合会的工作。其间也曾担任河北新报社的评论委员（1946—1956）。

第三期是教育、研究的时代，是作为立命馆大学文学部的教授，活跃于哲学讲坛的时期（1955—1976）。这个时期引人注目的是他加入了“昭和研究会”。

“昭和研究会”是应近卫内阁的要求，近卫文磨公爵曾在京都大学就学于西田几多郎。西田参加昭和研究会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吧。结果，不论是昭和研究会还是近卫内阁都没能抑制军部的专断独行，随着东条内阁的成立，日本不仅扩大了对中国大陆的军事侵略，而且没过多久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关于昭和研究会经过及其活动，服部健二《西田哲学与左派的人们》（こぶし书房2000）第5章有详细记载。为了制止军部独断地扩大战争的行动，以西田几多郎为首、以京都学派为中心而结成的。

船山与三木清一起参加昭和研究会的文化部，是在1938年至1942年期间。文化部的文化问题研究会，于1939年以三木清为代表，作为“新日本的思想原理”，总结出了“协同主义”的理念。参加这个研究会的船山除发表了《协同体理念的世界史意义》（《中央公论》，1939年3月号）以外，还写了关于东亚思想的几篇论文。

由以上的生活史，可以推测出两个深深印在战后船山心头的意识体验。

一个是：在第一期将要结束时，思想警察按惯例让保释的嫌疑犯写誓约书。据说誓约书的内容有：“以后不参加左翼活动”、“不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普及工作”等等，诸如此类。战后，船山把这作为“转向”，所谓的“转向”，在战后曾被作为测量战前、战时的左翼思想家们挫折和失败的准则，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思想评价不一定妥当。鹤见等人编入《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的《共同研究的转向》，1959—1962年，平凡社，是对战后思想史所提出的一个新论点。

在批判时局的过程中，虽然积极与命运抗争，但结果却被命运所吞没，笔者认为，通过“转向”能真实地看到这种知性的弱小与悲惨，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对于战后对于“转向”的简单的断罪，笔者不敢苟同。诚恳地进行了自省。

船山直率地谈论自己是“转向者”，《我的哲学六十年》后记，1984年，岩波图书中心信山社。这是反映他人格的、诚实的反省。战后不久他所写的责任论《关于责任》，载《理想》1947年第170期，船山信一：《著作集》，第五卷。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哲学清算。

另一个更重要的是：船山对中国的罪责意识。船山与三木清所加入的“昭和研究会”，其成立的动机中有对独断的军部的抵抗意识，但结果却对军部独裁的现实完全无能为力。尤其是他与三木一起所倡导的“东亚协同体”论，虽然是一种主张包括整个东亚的普遍的协同主义，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却间接地承认了军部侵略中国的政策与行动。

这成了深深地刺进战后船山内心的一根利刺，他对此进行了深刻反省，认为以日本为轴的东亚协同体论，其结果也就是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正因为反省了自己对中国所欠的这些债，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前往没有建交的中国大陆的民间学术交流团吧。我认为，那次访问中国对于诚实的船山来说正是一次赎罪的旅程。这些经历使船山对中国的关心和思考终身不变地保持了下来。

三、船山的学问之一：人学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

从船山访问中国时所作的第三次讲演、即在上海讲演的题目：“人学唯物主义的立场——相对于唯心论以及客观主义的唯物论”，就能看出船山对唯物主义的两个创见。第一，对唯物主义的客观主义是批判的。被称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的苏联时代的哲学、斯大林统治下的哲学，总体上是客观唯物主义。受其影响，战后日本的唯物主义的主流也是客观主义。与这种客观主义的主流相对抗，出现了主体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主体性派的潮流。船山属于这个潮流的后者，当然，他的“主体”是与采用意识主体或实存主义主体概念的唯物主义相区别的。正因为如此，他的第二个创见：“人学的”，才显得意味深长。

首先，从“人学”这个概念来看，所谓“人学的”（Anthropologisch）这个词出自费尔巴哈。在船山生涯的第二期、即水产业时代，他用了长达18年的时间来研究黑格尔与读解费尔巴哈。但是，这一时期船山在仙台渔业联盟的工作非常繁忙，要对渔村进行现场调查，以《渔村记》（1943年，水产社）为代表，船山在战时、战后写了很多关于渔村的论说，收录于《著作集》第十卷。要处理理事担当的事务，另外还要担任河北新报社的评论员。船山写了大约500篇社论和文章，参照《著作集》第十卷。因此，船山只有利用工作的间隙来进行哲学研究，用船山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个“星期天哲学家”，只有星期天才有思索和研究的时间。

“星期天哲学家”的成果有两个。一个是后来成为他学位论文的黑格尔研究，1962年，船山向东北大学提交的学位论文的题目是《黑格尔的现象学、逻辑学、实在哲学（Realphilosophie）的性格及其关联》，后来整理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形成与结构》出版（1963年，岩波书店），现在收录于《著作集》第三卷。另一个是对费尔巴哈所有作品的读解。这有一个惊人的成果，那就是船山一个人单独完成了费尔巴哈全集的翻译。《费尔巴哈全集》全十八卷，1973—1976年，福村出版。通过读解，船山学会了历史地看待费尔巴哈：费尔巴哈不仅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过渡，而且是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媒介。

船山对费尔巴哈的这个理解在其哲学立场上，结出了“人学”的果实，从而赋予了船山人学唯物论的形式和内容。马克思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至今所有的唯物主义都只是通过客体、乃至直观的形式来把握现实，而没有把现实作为人的感性活动来把握，参见F 恩格斯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部分。但至少，费尔巴哈不是从神、乃至超越的基体、超感性的基体中去寻求哲学的绝对始源，而是从“人”中来寻求。费尔巴哈认为“神学的秘密是人学”。以黑格尔为顶点的理论的、思辨的哲学的秘密既然在于神学，《哲学改革的临时提纲》，《费尔巴哈著作集》第三卷，Suhrkamp，第223页。那么神学就必须从人学开始。对人来说，人就是神。这种“人”是身体与精神统一的现实存在的人。人学是哲学的始源（Anfang），也是人学唯

物主义的立场。

船山说：“作为唯物论，人学唯物论强调客观实在，但人学唯物主义把主观也考虑为实在，而且只有与这种实在性的主观相对立而独立于外的客观才是真正的实在。”参照《人学唯物论的立场与体系》二之2《作为实在的主体的人》，《著作集》第四卷，第62页。

船山还从费尔巴哈那里学到了关于“人”的规定，即“人”在认识论上是实在主体，因此不单是思维主观（denkendesSubjekt），而是“身体—我”的主体。以黑格尔为顶点的近代哲学是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的。但是，笛卡尔的“自我”总是作为“思维主体”，毕竟也只是个意识主体。恩格斯，特别是列宁的唯物论的特征，在于把物质规定为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但船山很早就对此提出了疑问，他主张与客观实在的物质原理相对抗的，不是被还原为意识的思维主体，而应该是“身体—我”的主体。这是船山对倾向于列宁的唯物论规定的日本唯物论主流的批判。这里不可误解的是，并非用人学来替换唯物论。船山的“人学”，对于黑格尔体系来说，相当于作为“知识”的体系的预备学的现象学。

作为客观实在贯穿整个体系的“物质”原理，究竟怎样了？这是笔者早就持有的一个疑问，船山指出那是个解释的概念，使笔者得到了启发。参照田忍对《人学唯物论的立场与体系》的解说，《著作集》第四卷。

另外，笔者认为，必须追究“物质”概念的理念性。

四、船山的学问之二：人学唯物主义的体系构想与黑格尔

船山的唯物主义是世界观的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唯物论》，1933年，《唯物论研究》第四期，《著作集》第一卷。但在认识论上其特征在于，把“身体—我”的概念作为相对于客观实在的实在主体来定位。这是船山在他生涯的第二期、繁忙的渔村工作中读解费尔巴哈的一个重大成果。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大成果则是“人学唯物主义”的构筑。

1944年就已到仙台的船山，尽管以“星期天哲学家”自负，但他还是作为学院派的一个成员，开始了战后的哲学研究，属东北哲学会。船山继续进行并深化了从年轻时候就开始的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研究。1931年船山曾在《哲学研究》上分三次发表了关于对黑格尔逻辑学体系的理解的论文，同年还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岩波书店）。

前一节，我论述了以费尔巴哈为媒介的船山的“唯物主义哲学”。在这节，我将论述以黑格尔为媒介的船山的“人学唯物主义”，主要是船山人学唯物论的体系构想。

首先来看一下船山人学唯物论体系构想的原型——黑格尔体系构想，看看船山对黑格尔体系构想的理解。从船山向东北大学提出的学位论文（收录于《著作集》第二卷）可以看出，他对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如下理解：

（1）狭义的体系；（2）广义的体系。

狭义的体系是已经完成的体系，指哲学全书的体系。与此相对，广义的体系是“展开中的体系”。狭义的体系如下图所示：

精神现象学 || 意识学 |—逻辑学……（存在论。船山 |称之为本质学）
|—自然哲学…
|（实在哲学。船山
|称之为现实学）
|—精神哲学…

精神现象学作为“知识”的预备学，是意识所经历的从感觉的确信到绝对知识的漫长过程，船山称之为意识学。

船山的唯物论主张独立于意识之外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这与客观唯物论没有什么不同，但船山没有把意识的自发性、意识主观的实在性还原到物质上，而是在“身体性”的概念中寻求保证意识主观的实在性、因而也是保证其客观性的东西。这就是船山人学唯物主义的创见。

从这点来看，船山体系构想中的“人学”就相当于黑格尔体系中的“意识学”。同时这也是费尔巴哈的“身体—我”的概念对船山体系构想的积极贡献。的确，“身体—我”作为主体，只有通过人学的基础才能实现其作用于“物质—客体”之对象的、实践的活性。这正是船山自负的地方。

船山的体系构想可以整理为：

|—“人学”（“学”的体系的预备学）
|—“本质学”（黑格尔体系中作为本体论的“逻辑学”）
|—“现实学”（黑格尔体系中包含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的“实在哲学”）。

这个体系就是“人学”——“逻辑学”（“本质学”）——“现实学”的“展开中的体系”，换个说法就是“对于我们的”furuns的体系。与之相对，在客观上其自身的体系则是：

|—“现实学”
|—“人学”
|—“逻辑学”（存在论）参照《人学唯物论的立场与体系》第二部《人学唯物论的体系》四，《著作集》第四卷。

也就是说在船山的体系中，在认识论上，人学的“身体—我”的主体活动，作为对对象的模写、反映而得以成立；在实践论上，人学作为“身体—我”的对象化活动而得以成立。因此，1 人学就成为“学”的体系构想的预备学。2 作为人学的抽象，“逻辑学”得以成立。3 从更根本上把“人学”和“逻辑学”综合起来而得以成立的是“现实学”。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的”、即对于进行哲学研究的船山来说的体系。在客观上则构成了这样的体系构图：1 以“现实学”为最初的基础，2 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人的学说”，3 最后，作为“人学”的抽象、以及以“人学”为媒介的“现实学”的抽象，“逻辑学”得以成立。

只是，我觉得，船山一味地只想建立体系，却忽略了最根本的问题，即为什么“物质”是贯通此体系的宇宙法则和原理这个问题。列宁称为“物质的哲学概念”的、能成为哲学体系原理的“物质”，当然不是现实的“物”、感性的直观对象的“物”。即使把哲学的始源概念、能成为体系原理的概念说成是物质，那也必须把它形容为哲学的。从把物质说成是客观实在的那一刻开始，就必须对此加以理论的验证，同时这也是对“物质”是哲学体系的原理这个命题的验证。也就是说，在船山的体系构想中，关于“物质”的理论性问题被省略了，这是我很久以前就对船山所持有的疑问。 B20

以上，我在论述船山与中国的紧密关系的同时，试图解明他的人学唯物论的学术意义。在现代的世界思潮中，“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这个两者择一的问题正在失去其意义。哲学的历史曾经分为唯心论与唯物论两个阵营，并且曾经可以说是唯物论对唯心论的胜利。但是，20世纪结束时，随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套用唯物论与唯心论这两个框框来谈论哲学的时代也随之结束了吧。

像黑格罗那样，把哲学作为“知识学的体系”来构筑究竟有多大意义呢？现在，我们还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黑格尔曾把哲学作为“知识的体系”、“哲学全书的体系”来构筑，其中当然有对于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的百科全书家们工作的批判。他们所编撰的“百科全书”虽然是近代理性的总决算，但毕竟只是诸成果的集合，而没有一个统一的观念作为其原理，因而不能成为体系。

本来，所谓的哲学全书，作为“百科全书”，意味着“圆环的形成”。开始也是结束，换句话说，始源的原理也是终极的原理，知识的成果成为一个封闭的圆环时，“学说”就自成体系，这个论题不仅仅是黑格尔的，而且也是包括费希特和谢林在内的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共同论题。在这点上，马克思的学问也在那个范围内。

在寻求物质概念的理念性的同时，以这个概念为原理的唯物主义哲学可能会构筑成怎样的体系呢？在如今拒绝体系的哲学风潮中，哲学的知识是否可以成为学问的体系呢？这是个不能马上回答出来的难题，但至少，到我们接触船山的“人学唯物主义”时，这个问题就会摆在我们面前。

（西川富雄：《船山信一先生与中国》，卞崇道译校，责任编辑：张敦敏）

笔者曾在立命馆哲学会主办的“船山先生的学问”的研讨会上做了主题讲演。当时，曾把这个疑问向船山先生提出来讨论过。

另外，关于物质的理念性，值得注意的著作有梯明秀的《物质的哲学概念》（1958年，青木书店）。

书讯：

《留美哲学博士文选·当代基础理论研究卷》出版

钟 枚/文

北京商务印书馆已经于近期推出《留美哲学博士文选》第一卷，即“当代基础理论研究卷”。该书由牟博主编，由已经在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目前在北美或者国内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12位学者撰写而成。

据编选者牟博介绍，这卷《文选》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主体，由十位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哲学工作者的研究论文组成。这些论文都是新近在其相应领域内实行匿名审稿制选出，并在具有很高学术声誉的国际哲学杂志上发表的，在经过作者本人翻译成中文并且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改以后，收入本书。其共同特点是：第一，都经过了相应领域之中德高望重者的严格审查和作者的进一步修改完善；第二，涉及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应研究领域之中的、当代有关基础理论的前沿性问题(所以本卷名为“基础理论卷”)；第三，注重论证过程和论证方法；第四，强调遵守学术规范(包括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严格标明引文出处等)。

《文选》的第二部分对几个主要哲学研究领域(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科学哲学、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哲学)的近期发展进行了概述。六位撰稿人基本上都是在某一篇概述文章之后附有英文参考文献或者阅读文献书目。

牟博指出，编选这部文选主要是为了使国内哲学界能够及时分享当代哲学研究之中涉及前沿问题和方法论特征的国外研究成果，促进国内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和参与国际对话，能够听取和吸收国内哲学界对这些研究的批评，并且因此而加强与国内哲学界的联系和交流。这部文选的姊妹篇——《留美哲学博士文选·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卷》，也将于最近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责任编辑：艾彦）

[回主页](#)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哲学所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010)65137744-5520 传真：(010)65137826